

第八章 結論

韓戰為冷戰期間重要戰爭，從歷史、國際政治及戰略等角度看，它具有高度研究價值，在社會科學對臺灣研究日興的今日亦不例外。

韓戰前美國政府準備承認中共政權，對國府採取放手政策，不給予任何軍援，等待塵埃落定，兩國外交關係陷入空前谷底。韓戰爆發，美國為了國家利益對臺灣採取積極介入政策。韓戰固然為重要轉變因素，事實上，面對韓戰前新的國際情勢，美國政府基於國家利益等考量，對臺政策已逐漸在調整之中，中立化政策在韓戰前夕已然浮現，因此，該政策並非一時興起之作。

1950年6月25日北韓以「朝鮮統一」為由，動用軍隊向南韓入侵，爆發韓戰。二日後，美國總統杜魯門對韓戰公開發表「六·二七聲明」，該聲明內容涉及臺灣，包括：派遣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到臺灣海峽巡弋，執行兩岸停止相互軍事活動任務；提出臺灣未來地位問題，其解決方向為：等待太平洋安全恢復、對日和約或聯合國考慮予以處理。另外，韓戰爆發，國府提議擬派兵援助南韓作戰，杜魯門雖受到國防部與國務院意見影響，最後在決策上予以否決，但實際上美國有意去除臺灣國際角色，不願再與國府有任何牽扯，並防止國府反攻大陸。美國僅有意提供國府經濟援助，不再給予軍事援助，仍存在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之構想。

該項聲明已成為韓戰期間美國重要對臺政策主軸，日後美國在外交談判中，凡涉及臺灣者無不奉該聲明為圭臬，美國稱之為臺灣「中立化」。

所謂臺灣「中立化」政策內涵為：美國杜魯門政府於韓戰爆發採取軍事中立(派遣第七艦隊介入臺海)、政治凍結(提出臺灣地位問題以利國際介入)措施，防止臺海發生戰端，避免臺灣被共軍侵佔並藉以支撐韓戰，以維護國家最大利益。主要係當時中國處於分裂狀態，韓戰發生後聯合國之中國代表權問題更形複雜，美國唯恐蘇聯過分反彈，為維護自己國家利益趁韓戰之機會採取一項權宜措施，以軍事手段介入臺灣。

臺灣中立化政策為韓戰期間美國遠東政策重要的一環，韓戰前，美國對臺灣採取「人地分離」思維，認為臺灣對美國具有戰略安全利益，應全力加以維護，但認為中華民國政府危在旦夕，伺機與中共交往。基本上，美國對中華民國政策仍維持大陸淪陷前的政策，不給予國府軍援，採取「放手」、等待「塵埃落定」消極政策，形同放棄中華民國。

韓戰前，美國政府公開宣稱對臺灣無政治意圖，再三宣告臺灣主權歸屬中華民國。韓戰爆發，杜魯門政府改變過去消極態度，對臺灣採取積極介入政策，除派遣第七艦隊進入臺海外，更提出臺灣地位問題。其對臺政策在韓戰前後轉變甚大，其間呈現出強烈對比。針對其間對臺政策的調整，本論文從決策模式說明並解釋杜魯門政府對臺中立化政策決策過程，以了解其決策目的、決策思維與相關影響因素。

美國對臺政策，涉及諸多國內與國際因素，尤其中國在分裂之初韓戰爆發，遠東情勢危急。美國始終認為臺灣對美國具有戰略價值，一旦被與美國不友好政權佔領或統治，足以危及美國國家安全利益。因此，在決策認知當中認為臺灣不可失陷。從決策過程看，韓戰爆發美國政府派遣第七艦隊至臺海巡弋係為了美國國家安全利益，並非為了中華民國政府，換言之，其決策主要目的絕非為了保護中華民國生存而來。

韓戰爆發後一月餘，美國政府為提升對臺灣關係，國務院低調地派藍欽公使駐臺。他多次表示不同意國軍支援南韓作戰，不表支持國府反攻大陸等。如以韓戰前(第三章)與韓戰後(第四至六章)美國對臺政策相互比較，在本質上並無任何差異，質言之，中立化政策係因韓戰爆發，美國政府為維國家利益調整對臺政策，亦為一項權宜措施，且不排除兩國中國政策。其主要政策內涵盡在「六·二七聲明」之中，在時間上該政策貫穿整個韓戰期間，並隨著韓戰停火而結束。

本論文研究結果顯示，韓戰爆發，美國政府之臺灣中立化政策的主要目標並非在「拯救臺灣」而是為了自己國家的安全利益，趁機介入臺灣，以利日後維持其國際領導地位，其決策思維與政策的調整即為了國家利益。

事實上，中國大陸淪陷後，韓戰爆發前，美國對華政策原本不想再介入

中國事務，沿續一貫的「放手」政策，等待塵埃落定。然而，中共一直在積極準備「解放臺灣」，臺海戰雲密布，臺灣危在旦夕，韓戰爆發，美國以大國姿態順勢介入中國事務，以保住具有戰略價值的臺灣為首要目標，但未必對中華民國政府表示友好與支持，從決策過程的研究清晰可見。

從國際關係理論看，決策研究屬於政治學及行為科學，為許多學者窮畢生心力所研究的對象。¹然而，筆者從文獻回顧中發現，國內外少有學者運用艾理遜決策理論於美國中立化政策決策之研究。

從美國政府之臺灣中立化政策決策過程看，該政策雖屬美國政府對韓戰權宜之計，國府與中共對此皆不表認同。因為，美國中立化政策嚴重涉及國家領土與主權問題。影響中國統一大業甚大：國府要反攻大陸，中共則要解放臺灣。兩岸分離至今雙方並無官方交往關係，在外交戰場的競逐中，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對抗關係仍然嚴峻。

兩岸對中立化政策的反應與表達方式各異其趣，中共與國府分別屬於不同集團國家，中華民國對集團內成員國之整體戰略價值取決於領導國(美國)的認知，在處理上採取包容的態度；中共則大肆批評美國介入行動，並認為美國武裝侵略國土。此與當時冷戰期間兩極對抗體系有關。

對中共而言，中立化政策演變結果，使中共「解放臺灣」、「完成祖國統一大業」計畫失之交臂。相對的，國府原可藉援助南韓作戰進行反攻大陸，但是喪失先機在前；繼而，第七艦隊阻止國軍行動在後。國府一直未能實現「反攻大陸」、「光復大陸失土」國家目標。中國長期分裂實肇端於此。

美國杜魯門總統基於國家利益，包括：國家安全利益、國家角色、威望及總統個人利益考量，採取軍事手段介入臺海，以維護自己國家安全。

基本上，美國政府在態度上認為，中華民國與否存在，並非重要決策選項，因為，直至 1950 年 12 月間，美國仍希望未來與中共政權交往。美國在韓戰期間對臺政策的重點為，臺灣與澎湖是否能夠確保，不致淪為共黨所佔領。美國只關心其自己國家利益，期望韓戰盡快結束，將美軍兵力移

¹ 蔡瑋，《中共的涉台決策與兩岸關係發展》，頁 9。

轉至歐洲。在國際體系與國際威望的維護下，維持其國際間領導地位，足與蘇聯所領導的集團國家相抗衡。此為韓戰時期，兩極體系下的國際環境，各集團成員國自然會受到當時國際體系的制約與影響。

檢視往後的歷史發展，美國在 1951 年 2 月在聯合國提出「中共為侵略者」譴責案。1951 年 4 月美國國防部宣佈成立美軍顧問團駐臺，軍事援助臺灣，5 月 18 日由國務院遠東助理國務卿魯斯克為臺美關係定調為：北京政權非中國政府，美國承認中華民國政府。1954 年美國與中華民國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兩國建立起緊密的軍事聯盟關係，美國以大量軍事援助臺灣，視臺灣為反共力量的一部分，至今臺灣軍事體制與武器系統仍受到美國影響。

筆者認為，此一發展主因為在國際體系下，韓戰爆發，中共參與韓戰，中共軍隊與美軍在朝鮮半島兵戎相見，美國與中共彼此仇視日甚一日，美國終於認清中共「狄托化」已不可能。

另外，國府一直站在反共最堅強的一面，原美國對大陸時期政府貪腐印象，在國民黨改革下，推動民主與經濟建設，改善了不良印象，美國政府開始改變對臺政策，至韓戰後期，美國政府才覺悟到中華民國存在對美國的利益，開始認真思考給予臺灣軍經援助。此即陳誠所稱美國政府對臺政策由「認地不認人」到「既認地又認人」過程（地係指臺灣戰略地位與價值，人係指政府）。此時，中華民國已走過歷史上最艱辛的歲月。

韓戰爆發，杜魯門總統在「六·二七聲明」中，命令第七艦隊到臺海執行中立化任務，雖屬軍事行動，但此舉實為美國介入臺海之始。日後兩岸關係一旦出現緊張或危機時，美國政府難以置身事外。

美國採取軍事介入臺海造成國府認為主權受損，但在軍事聯絡兩國需有綿密管道以為支撐，於是美國政府在藍欽公使駐臺之際，同時派遣三位軍事武官(含少將武官乙員)。國務院對此新聞之處理顯得相當低調，在其外交(機密)電文強調派藍欽等人駐臺純為美臺軍事關係，並非在提升外交關係。

筆者以為，韓戰爆發，此舉一方面做為對國府外交上的彌補，另一方面在兩國間建立起更為密切的軍事關係，可對韓戰形成有利態勢。

從美國對臺政策發展看，在政策上美國的確曾產生過愛恨情結。艾奇遜在 1959 年著作中曾對美國對華政策回顧：「談及我們對華政策諸多壓力，一部分為金錢利益所鼓動，一部分則為前政府攻擊下所產生的情緒。另外，對遠東事實與公開方向無法做出安定分析，與中國產生愛恨糾結。」²足以證實，美國對中華民國偏見依舊存在，亦顯示對美國對華政策之複雜情緒與無奈。顯然，在對臺政策決策上往往難以自圓其說，如美國想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又迫於國內民意及韓戰等因素；想放棄國民黨政府又要保護臺灣戰略價值不致衝擊自己國家安全等。「對遠東事實與公開方向無法做出安定分析」，於是中立化政策成了最佳選項。本論文透過決策研究，從決策過程中可說撥雲見日探得真相。

美國對華政策的複雜情結中，韓戰爆發，美國調整態度轉為積極介入，提出臺灣中立化政策，受到不少挑戰。杜魯門與麥克阿瑟的衝突主要因素為，兩者對臺灣中立化政策看法分歧，尤其在面對韓戰決策，杜魯門的政治手段與麥克阿瑟的觀點南轅北轍，衝突時起。亦造成日後麥克阿瑟去職事件。

1953 年艾森豪總統就任後，以第七艦隊無義務保護一個在韓國與美國作戰的國家為由，宣告中立化政策結束。但美國對臺海的介入並未因此而結束，反而日後臺海危機再起，對美國挑戰日深，與國府關係日益密切。1958 年中共攻擊金門外島，美國與中華民國的政治與軍事關係日益密切。

綜觀韓戰前後美國對臺政策，在中共尚無明顯意圖入侵臺灣前，並未涉及美國國家利益威脅問題，美國不予理會；韓戰前甚至到韓戰爆發後，美國政府只關心臺灣安全是否會影響美國戰略利益，避免臺灣淪陷在共產黨手中，只要臺灣在與美國友好政府統治下，甚至是地方政府亦可接受。因此，美國政府於韓戰爆發為了維護國家利益由放手政策調整為中立化甚至介入政策。

以下分別就研究發現、決策過程與結果、史實部分、理論運用及研究心

² Dean Acheson, *Power and Diplomacy*, p.18.

得等加以論述。其中理論運用，理論驗證及建議已在前一章(第七章)詳述。

在研究發現方面有：兩國間決策思維差異甚大、決策情境之英國因素、決策時機與介入行動等，為筆者對中立化政策決策過程之研究發現，在國內外學者少有論及或僅略加提示，茲分述如下：

一、兩國間決策思維差異甚大：(一)韓戰期間美國與中華民國彼此在對外政策思維落差甚大。對第三次世界大戰可能發生，美國惟恐避之不及，因為一旦發生大戰，美蘇兩國將陷入極大災難；國府則認為世界大戰發生美國將傾全力軍援國府，並可藉機反攻大陸。(二)歐亞受重視程度有別：美國在政策上有「重歐輕亞」、「保日重護臺」之嫌。視韓戰為有限戰爭，希望快速結束韓戰，將兵力移轉歐洲；國府則以亞洲最具反共經驗者自居，認為全球問題源自亞洲中國大陸。(三)反攻大陸政策看法呈現兩極：美國不表支持國府反攻大陸，不給予任何國際角色，婉拒國軍援助南韓作戰，杜魯門總統對此心知肚明；國府視韓戰為反攻良機，將反攻大陸訂為國家目標，且一直寄望麥克阿瑟將軍能影響美國決策。(四)切割處理原則：美國政府對臺政策出現處理原則為：1.將韓戰與國府做切割處理；³2.將臺灣戰略價值、地位與國民黨政權分離處理；3.重視對臺灣軍事關係，迴避與國府政治關係，官方文件或公開場合談話對國內人民盡量避免提及臺灣。筆者在大量閱讀中發現國內學者張淑雅提過第1、3項，第2項則為個人研究結果之補充，且為重要關鍵因素所在。因為中國大陸赤化後美國軍方特別重視臺灣戰略地位與價值，但在決策過程只能就組織立場提出建議，國務院則傾向於政治手段解決問題。杜魯門政府對國府不抱希望，在不影響美國國家安全利益下，以國家內政治角度處理，力求避免再度引發政治效應，決策結果自然出現切割(分離)處理現象。此一原則國府難以理解，對杜魯門之不滿可以想見，因此麥克阿瑟成了國府信賴朋友。筆者認為此係臺灣戰略價

³ 杜魯門與國會領袖對談顯示，其韓戰決策係按聯合國決議案處理。但是，對臺灣的決策則坦承未經聯合國同意而逕行處理，此為將臺灣與韓戰脫鉤處理。詳見 Edwin C. Hoyt, "The United States Reaction to the Korean Attack: A Study of the Principl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as a Factor in American Policy-Making,"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55, No. 1 (January, 1961), p.68.

值足以影響美國國家安全利益，中立化政策成爲美國在國際現實環境中軍方與外交體系妥協結果。

二、決策情境之英國因素：(一) 英國政府爲了維護遠東利益，關心香港並希望和中共做生意，中共政權成立後即予承認。美國雖有意與中共交往，但中共一向敵視美國，韓戰前美國使館人員受中共審判，韓戰期間美國派遣第七艦隊至臺海，此舉中共視爲侵犯中國領土主權，此時美國與中共關係可用「新仇加舊恨」來形容，因此，美國政府一直苦無良機與中共進行交往。(二)韓戰發生，中立化政策一經公開，英國多方想介入美國的決策以維英國利益。爲此，英美兩國多次舉行高峰會談，至 1950 年底會談中顯示，美國與中共交往仍抱希望。(三)傳統上美英兩國關係密切，然而，美國仍以自己國家利益考量，受限韓戰戰場變化及美國國家利益，雖然來自英國的動作不斷，但對美國的決策影響仍屬有限。

三、決策時機與介入行動：韓戰前夕中立化政策已然成形，在「應介入時就會介入」下，韓戰成爲美國介入臺灣的機會。與其說第七艦隊防衛臺灣，不如說第七艦隊在介入臺灣。因此，韓戰爆發提供了美國對臺政策轉變的機會。對美國第七艦隊防衛臺灣之說，吾人應回歸歷史真相，指出係美國爲了國家利益而改變政策並介入臺海。

綜合以上論述，在國際體系下，美國對臺政策出現變與不變，但唯一不變者爲美國國家利益考量，在其政策決策中清晰可考。

就決策過程與結果看，在 6 月 26 日布萊爾會議決策過程中，美國政府視韓戰爲美國可供運用良機，並藉此派遣第七艦隊至臺海，採取軍事力量片面介入臺海。在公開聲明中，美國政府強調區域性和平，以表現出國際道德原則，以利國際間領導角色與地位之維護。但在決策過程中只顧及美國國家利益，以致國府對中立化政策未必滿意。國府對美國仍有外交、經濟及軍事利益需求，只好低調以對。中共則認爲美國干預中國主權，在缺乏安全感下參與韓戰，中立化政策成爲中共參戰因素之一。就決策影響力而言，在決策參與者方面，以總統及國務卿的影響力最大，在決策組織能力方面仍以國務院最大。

從決策結果對我影響看，在中立化政策下國府無緣援助南韓作戰，反攻大陸計畫因而受阻。事實上，筆者從美國的韓戰軍事戰略看，國軍即使參加韓戰亦難以揮師反攻大陸。此外，美國對華政策並不支持國府在大陸用兵，以免引發美蘇大戰。因此，美國在決策之際即考慮到不與國府有任何瓜葛，在政治上對國府予以凍結，不想再給予任何國際政治角色。杜魯門政府順勢提出「臺灣地位問題」，嚴重損及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1971年中華民國退聯合國之後，國際地位一落千丈。時至今日，與「臺灣地位問題」有關的統獨議題仍影響國內政治、兩岸關係及美國對華政策。

中立化政策成了美國國家利益的政策辯護。美國對外政策的研究與決策事屬機密作業，但從決策參與者公開言論中仍有蛛絲馬跡可尋，甚至可探知其可能方向。當然，仍要從美國全球戰略及遠東政策架構中去研判。

從歷史事實分析、決策結果與影響方面看，第七艦隊派遣表面上有助於臺灣的安定，甚至有人認為美國的行動係爲了救臺灣，但美國對此主要決策目的並非在救臺灣，而是爲了自己國家利益而來。

杜魯門總統另外提出臺灣地位問題，將不可測的國際影響因素減少。筆者發現，美國所採取軍事介入臺灣手段與臺灣地位問題提出有一決策上重要思維，即一旦美國對臺灣採取軍事行動，在《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下，蘇聯將給予中共援助，其後果難料，臺灣予以中立化之介入，蘇聯不致於不悅，此爲美國最有利的介入情況。⁴

然而，從決策過程看，如我國學校歷史教材中，對韓戰或第七艦隊的描述：「協防臺灣」、「韓戰爆發，美國更恢復對中華民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援助」。對此一段歷史描述與事實略有出入，建議應概要說明美國係爲了自己國家利益，藉機(韓戰)對臺灣採取介入手段，以求回歸歷史真相。

另外，從美國決策的過程了解，韓戰爆發之際，美國仍維「放手」政策，「等待塵埃落定」，爲了自己國家利益已從韓戰前數週漸漸調整爲中立化政策及介入的決策選項。

⁴ "The Ambassador in the United Kingdom(Dougla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uly 24, 1950,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FRUS*, 1950, Vol. 6, p.389.

在研究心得或建議方面，列舉如下：

- (一)杜魯門「六·二七聲明」中命令美國第七艦隊巡弋臺海，雖有助於防止中共犯臺。國府在蔣中正軍事戰略指導中，國府已正式遷臺，但仍有國軍主力部隊部署於中國大陸西南方，有效牽制共軍三、四野部隊，共軍僅以小部隊攻佔大膽島，為國軍所殲滅。在日後多次外島戰役中，如1949年10月「古寧頭戰役」共軍再敗，對於此點，蔣中正對保衛臺灣功績吾人應予肯定。中共犯臺準備尚未完成，攻打金門外島失利，中共「解放臺灣」行動受挫。換言之，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救了臺灣之說有待商榷。因為，美國中立化政策決策主要目的並非在救中華民國政府。
- (二)在美國對外政策中，所公開政策為決策結果之呈現。如從其決策過程看，即使組織部門出現立場分歧，決策者認知互異，各單位較勁等現象，然而，國家利益共識仍為最大公約數。其在決策正式公開前，政府官員的言談中絕不輕易說出決策方向，尤其美國在軍事介入他國時，道德或和平成了外交的掩飾和藉口。所謂「無風不起浪」，一旦美國官員出現「政策不變」之說，該政策可能已有所討論，甚而已經出現新方向或新政策，未來有待國人明察。
- (三)韓戰停火之後，美國與國府回復到正常外交關係，甚至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其中影響因素為，國府銳意改革、中共參與韓戰及美國在全球採取反共戰略，另外，藍欽大使的努力功不可沒。
- (四)在我國外交工作中，顧維鈞與葉公超等我國傑出外交官具有外交專業與工作精神，在外交折衝中，發揮個人的智慧與外交官特質，在艱困的國家處境中努力不懈，足堪我外交後進或國人學習。目前我國相關外交文獻記錄與保存方面，有待努力或改善之處仍大。
- (五)所謂「臺灣地位未定」係中立化政策產物，為國際強權政治下為求有利臺海介入行動，避免引他國阻撓，維護自己國家利益而來。國人絕不可自我矮化。「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千萬不可自我否定。

(六)檢視二百餘年臺灣歷史，臺灣具有戰略地位與價值，早已成爲國際強權爭相覬覦對象，儘管時代背景與國際環境不同，臺灣一直具有戰略地位與價值，此爲臺灣寶貴資產，未來臺灣的決策者要能明察其價值所在，善於運用此一優勢才能在國際間創造空間，甚至形成舉足輕重地位。

(七)未來中國前景有賴兩岸中國人共同發揮高度政治智慧，採取雙向、互利、互惠思維，深化交流，從源頭(中國分裂與中立化政策)探求本質，異中求同，化解歧異，中國的未來仍大有可爲，但仍需耐心以對，兩岸要各自發展一段時間，再談政治解決，始能克竟全功！

在未來研究建議方面，筆者發現英國對中立化政策的掣肘，伺機介入美國決策，美國如何以對，國際霸權如何由英國移轉至美國，可由中立化政策決策做爲研究案例，此爲筆者研究後的建議。

另外，國際政治學大師莫根索將國家威望解釋爲「權力上的聲譽」，它既可做爲嚇阻又可藉此準備戰爭。它足以嚇阻別國不致走向戰爭，同時，一旦在該威望政策失敗時，軍事動員即可取得最有利的軍事態勢。美國政府介入臺灣即在取得最有利的軍事態勢，以維護自己國家安全利益。本論文研究在外交、軍事上的決策與運用可獲充分解釋，未來值得加以研究。以上二項均可供學者做研究上的參考。

韓戰期間美國對臺政策，由韓戰前(1948年底)開始檢討對臺政策至韓戰爆發前，其中雖有一些演變，但並未脫離放棄國府之消極政策，由於企圖與中共政權交往念頭日漸受到衝擊，但仍未完全消除該想法。只不過中共參與韓戰後，朝鮮半島美軍與共軍交戰，美軍官兵傷亡慘重，美國政府難以與中共建立正式外交關。

在中立化政策決策之前，討論臺灣未來時，美國國家威望的維持一直是參與決策者所關心的焦點。韓戰爆發，美國雖然調整了對臺政策，以軍事手段積極介入臺灣，派遣第七艦隊實質上形同封鎖臺灣海峽，而以「中立化」臺灣美其名。可免除國際間外交紛擾，降低對兩岸的衝擊。其所提出

臺灣地位問題，至今後遺症仍然存在。美國杜魯門政府拒絕國軍援助南韓作戰，除不願讓國府有反攻大陸機會外，有意抑制國府之國際角色並侷限其國際活動空間，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受到衝擊甚大。

透過艾里遜三個決策模式對中立化政策決策過程的檢視，可彌補一般純組織決策之不足，對整體決策過程以軍事與外交互動關係加以解釋，可減少兩者在研究上各行其是的缺點，輔以政治決策理論之整體決策結構分析，多了詮釋上的角度，有利決策全盤性了解，提高了解釋力。唯在艾里遜理論運用上適合研究的個案為：(一)外交政策的決策或在外交上出現重大轉變之決策；(二)危機處理之決策；(三)適用於一般民主憲政國家之決策，以國家階層為主；(四)在選用模式做為決策解釋前，宜先詳細了解該決策之過程，並採取個案研究；(五)決策之個案研究宜將決策過程與結果予以固定，如一次或持續數次之決策會議之決策過程及結果，以求減少變數；(六)從不同模式可看出決策目的、目標、思維及相關決策影響因素。在個案取材上一定要有完整的解密檔案或文獻，否則難以做整體的詮釋。

同時在降低決策過程變數下，研究結果有助於美國對外政策決策的了解，提供未來解決兩岸問題的思考方向，對美國未來可能再介入中國事務的思維可預做處理。

綜合各章論述，經假設與驗證，並以決策結構之各項過程做為佐證，符合本論文研究目的、各項模式分析與假設之驗證。所推演出結論符合本論文研究主旨：在韓戰爆發後美國對臺政策由放手政策調整為中立化甚至介入政策以維護其國家利益。